

# 云南高原湖泊城市“山水营城”传统地景研究 ——以滇池、洱海地区为例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of “Shan-Shui City” in Yunnan Plateau Lake Regions: Case Studies of Dianchi and Erhai Areas

尹露曦<sup>1\*</sup> 成朋轩<sup>1</sup> 孙波<sup>2</sup>  
YIN Luxi<sup>1\*</sup> CHENG Pengxuan<sup>1</sup> SUN Bo<sup>2</sup>

(1.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昆明 650500; 2.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 650100)  
(1.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2. Yunnan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100)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5)08-0107-08  
DOI: 10.12193/j.laing.2025.08.0107.012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5-02-02  
修回日期: 2025-04-15

## 摘要

滇池、洱海地区作为云南高原湖泊地区的代表, 历史时期城市营建充满“山水营城”地景智慧, 目前对其展开的研究有待完善。基于历史文献梳理, 从山水文化溯源、山水空间营建、山水意境呈现三方面开展滇池、洱海地区传统地景研究。结果表明: 云南高原湖泊地区山水环境本底具有较强的向心性、阻隔性, 其中水域变迁对聚落发展影响最为显著; 汉文化与佛教文化综合作用于滇池、洱海地区的山水文化思想及山水审美; 云南府城及大理古城背山面水, 具有典型的“山水坐朝”格局, 居游于山水体现了人地情感的深层次交融; “昆明八景”“太和十六景”均充分涵盖山、水、城要素, 山水意境特色突出。提示山—水—城融合是云南高原湖泊地区发展的重要原则, 在保证山水视廊连通性的同时, 通过激活贯穿古今的山水游览方式, 以“亲历”的知觉感知体验重新搭建人地情感链接。旨在补充西南地区地景成果, 并为“山水城市”的现代性探索提供思路。

## 关键词

地域景观; 传统城镇景观; 山水营城; 高原湖泊; 云南

## Abstract

The Dianchi and Erhai Regions, as representative areas of Yunnan's plateau lake regions, have historically exemplified urban construction imbued with the landscape wisdom of “Shan-Shui City”. Current research on their traditional landscapes remains insufficient and warrants further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raditional landscap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focusing on the origins landscape culture, spatial construction, and aesthetic present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lateau lake environments exhibit centripetal and isolating characteristics, with changes in water bodi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ing settlements. Han and Buddhist cultures have historicall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shaping the regional landscap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principles of the Dianchi and Erhai Regions. Cities such as Yunnanfu and Dali, distinguished by their mountain-back and water-facing layouts, exemplify profound emotional connec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the land. The “Kunming's Eight Sceneries” and “Taihe Sixteen Sceneries” demonstrate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mountains, water, and urban elements. The stud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mountains, water, and urban areas as a foundational principle of development. It also proposes that landscape tourism can facilitate the reestablishment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s through experiential engagement. This research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landscape achievements in southwestern China and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 “Shan-Shui City”.

## Keywords

regional landscape; traditional urban landscape; Shan-Shui City; plateau lake; Yunnan

## 尹露曦

1990年生/女/云南昆明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地域景观

## 成朋轩

1998年生/男/云南昆明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 孙波

1989年生/男/湖北武汉人/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1030869612@qq.com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践行过程中的“中国特色”始终与“山水”密不可分<sup>[1]</sup>。山水是中国文化的本源, 即使当下城市生活内容和价值观有所改变, 但据此说城市必将

失去原有的美学存在基础是不成立的<sup>[2]</sup>。从历史城市“山水营城”地域景观(简称地景)智慧中探索当下城市的现代性, 有利于明确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 是真正的“回过头去



图1 研究思路

Fig. 1 Research approach

图2 滇池、洱海地区发展概况

Fig. 2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Dianchi and Erhai Regions

寻找未来”。

目前国内传统地景研究开展较多，特别是平原地区，如杭州、绍兴、苏州、福州、南京等地<sup>[3-5]</sup>，涉及山水文化溯源<sup>[6]</sup>、山水空间模式<sup>[7-8]</sup>、山水意象<sup>[9]</sup>等。相对而言，西南地区研究多集中于川渝地区，如毛华松等<sup>[10]</sup>对川江流域传统城镇地景格局的研究；杜春兰等<sup>[11]</sup>对嘉陵江沿线古城山水营建特征的研究；许芾斌等<sup>[12]</sup>对重庆城池选址及形态的研究；李恒<sup>[13]</sup>对成都平原地景的研究等。与上述研究相较，云南高原湖泊地区具有独特的高原断陷湖盆地景观特征及鲜明的宗教、文化等人文特色，使其在本底环境、空间尺度、城建演变历程等方面与其他地区有明显区别，而目前地方历史类研究侧重人类学、民族学<sup>[14-15]</sup>、少数民族村落<sup>[16]</sup>等，针对云南高原湖泊地区传统地景展开的研究相对有限，有待完善。

昆明、大理均为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山水文化沉淀，对其展开的传统地景研究有利于解读历史城镇与山水相融的营建智慧，思辨当下城市在保护基础上进行的“山水营城”创新发展模式，为探索“山水城市”发展路径提供历史理论依据。研究采用历史文献梳理方法，选择滇池、洱海地区作为云南高原湖泊地区代表，依据

“基底—营建—境界”<sup>[3]</sup>的底—图—境递进逻辑，从“山水文化溯源”“山水空间营建”“山水意境呈现”三方面展开详细分析(图1)。

## 1 研究区域概况

历史上，滇池、洱海地区都曾作为地方政权的核心区域，对云南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西汉之前，云南相对独立，其中洱海地区尚处于游牧社会，而滇池地区则发展出完备的地区统一政权“滇国”。西汉时期，汉武帝收降滇国设益州郡，并将郡治设在今滇池地区，中原汉文化开始与地方民族文化融合<sup>[17]</sup>。隋末唐初，洱海地区南诏崛起，其后逐步发展为少数民族自治王朝——南诏国及其继承者大理国，云南政治文化中心随之西移。南诏、大理时期以洱海地区阳苴咩城为首府，并在滇池地区建都阐城为别都<sup>[18]</sup>，这期间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佛教文化相融相促。元破大理，再次统一云南，并将行政中心迁回滇池地区。明清时期，随着军屯发展，汉民大量迁入，中央对地方实施有效管控，地区发展实现长治久安<sup>[19]</sup>(图2)。

## 2 山水文化溯源

### 2.1 山水环境本底

高原断陷湖盆的典型地质特征赋予了云

南高原湖泊地区向心性、阻隔性显著的山水本底特色(图3)。其中，环山界定了人居的物理及心理边界。滇池地区湖盆周边山体包括金马山、碧鸡山、长虫山、白鹤山等，碧鸡山最高点与滇池水面落差约620 m。洱海地区四围群山包括苍山、鸟吊山、东山等，苍山最高点与洱海水面落差高达2 000 m。地区特有的山系环抱模式带来了明显的地理阻隔性，同时限制了历史时期人群的迁徙和城市的建设，也带来人认知地图的相对隔绝。湖泊为心，空间向心性，水岸坝平地为人居聚落发展提供了条件。滇池南北长约41 km，东西最宽处约13 km，为南北向浅水湖泊；洱海南北长约43 km，东西最宽处约8 km，为南北向较深湖泊<sup>[20]</sup>，狭长的水面形态使湖盆岸线视觉感受倾向于朝湖心汇聚。此外，坝平地区因有溪流顺山而下汇入湖体，土地肥沃易于耕作，汉晋时期人居活动即围绕湖盆坝区展开，包括水稻耕种、房屋建设等。

山水本底中，水域变迁对聚落影响最为显著。云南高原湖泊远古时代水位均远高于现在，随着区域地壳运动，水位下降、土地陆续涸出形成河道，核心聚落位置随水位变化而改变<sup>[21]</sup>。以滇池地区为例，随着东北岸逐渐露出陆地，核心聚落由南岸转移至北岸。特别是南诏、大理之后，城建活动越发集中

于坝区北岸开阔的地方，并逐步展开背山面水的秩序化营城活动(图4)。此外，聚落周边洒出土地逐步被开垦为农田，进一步使陆地面积增大。可以说，水文条件的变迁影响了聚落发展，聚落发展也反作用于河湖发育，两者相互影响、相互适应。

## 2.2 山水历史文化

原始本主文化体现了较深的崇水、敬水思想<sup>[22]</sup>。由于云南高原湖泊地区早期发展受到山峦天然屏障的阻隔，缺乏与内陆的交流，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现象，其中对湖泊的依赖和敬畏是早期本主文化的重要特征。苍山十八溪和洱海在滋养白族先民的同时，也让先民形成了独特的水崇拜体系。水崇拜不仅体现在白族的创世神话中，更体现在传统的节庆及祭祀活动中。从古至今，几乎每一个白族村寨都有本主庙，本主作为村寨的守护神，是先民心中洱海的海神，能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个村子的本主庙因此成为村中建筑最宏伟、村民活动最集中的场所，足见水崇拜在洱海地区传统文化中的分量。

汉文化与佛教文化在唐宋时期高度融合，对滇池、洱海地区营建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儒学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盛行<sup>[23]</sup>。其中，儒学文化融入中原山水营城思想，影响了人们的山水审美及营城方式<sup>[24]</sup>。南诏设首府于洱海阳苴咩城，别都于滇池鄯阐城，其东西京制度高度效仿唐朝；两城在营城手法上大量学习唐长安城，自此之后城市有特定轴线和分区，体现了中原营城思想的深入影响。山水文化方面，南诏、大理时期先民对山林的态度逐步由敬畏转化为欣赏，并出现了很多具有中原特色的山水游赏方式，如“曲水流觞”“登山弈棋”等<sup>[25]</sup>。佛教作为南诏、大理时期全面信仰的文化宗教，经主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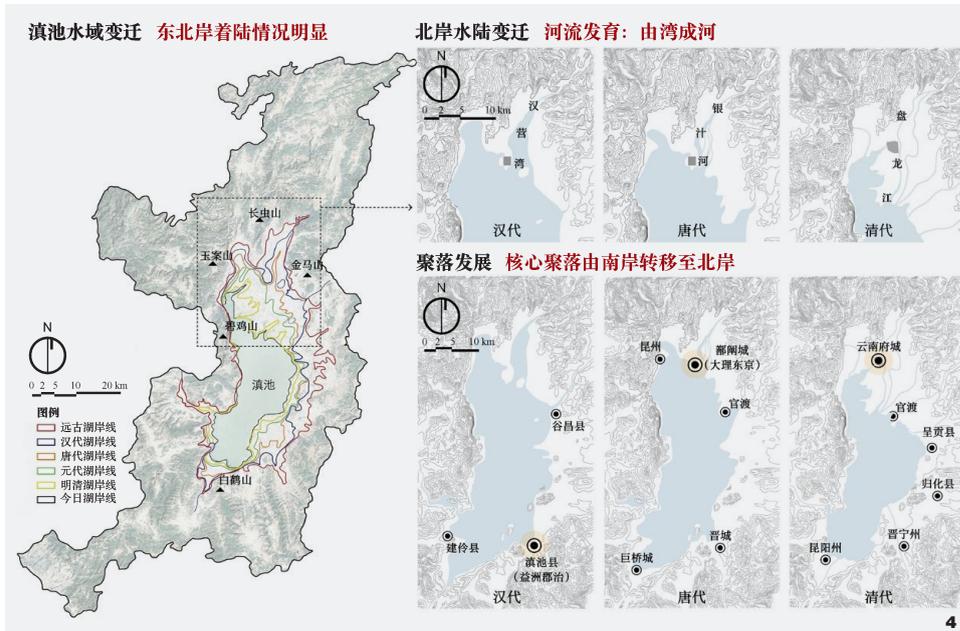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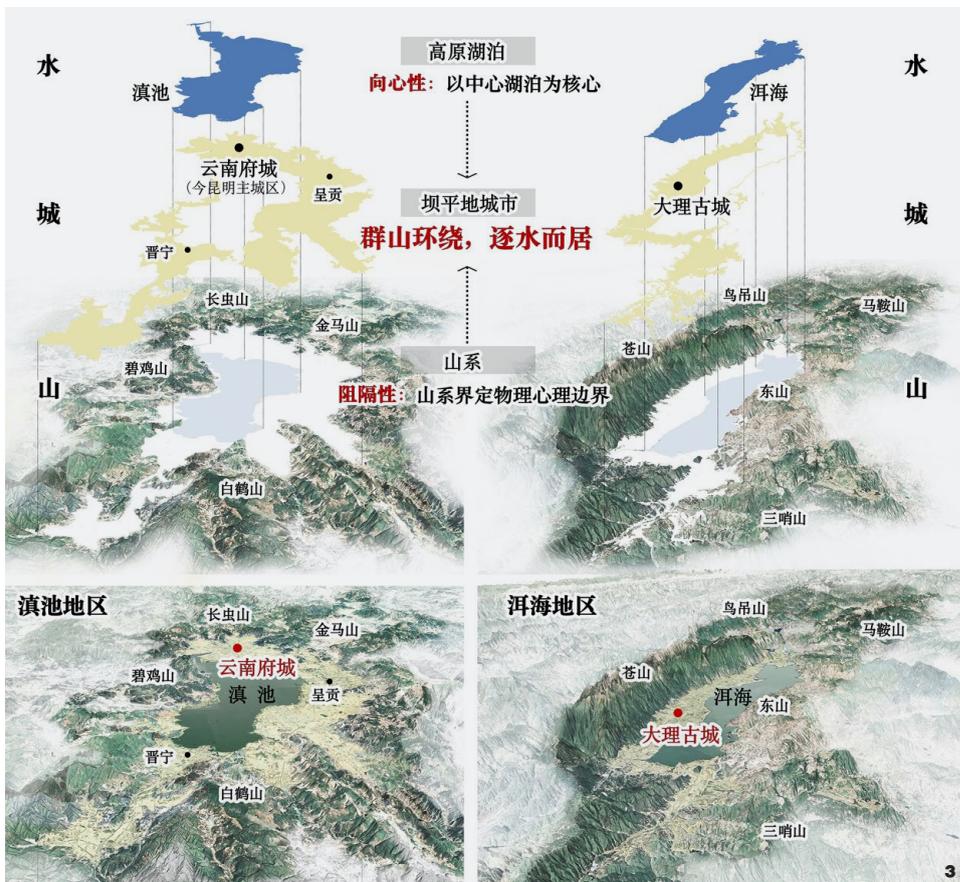


图3 滇池、洱海地区山水本底特色  
Fig. 3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anchi and Erhai Regions

图4 滇池水域变迁与聚落发展  
Fig. 4 Water area evolution and settlement development in the Dianchi Reg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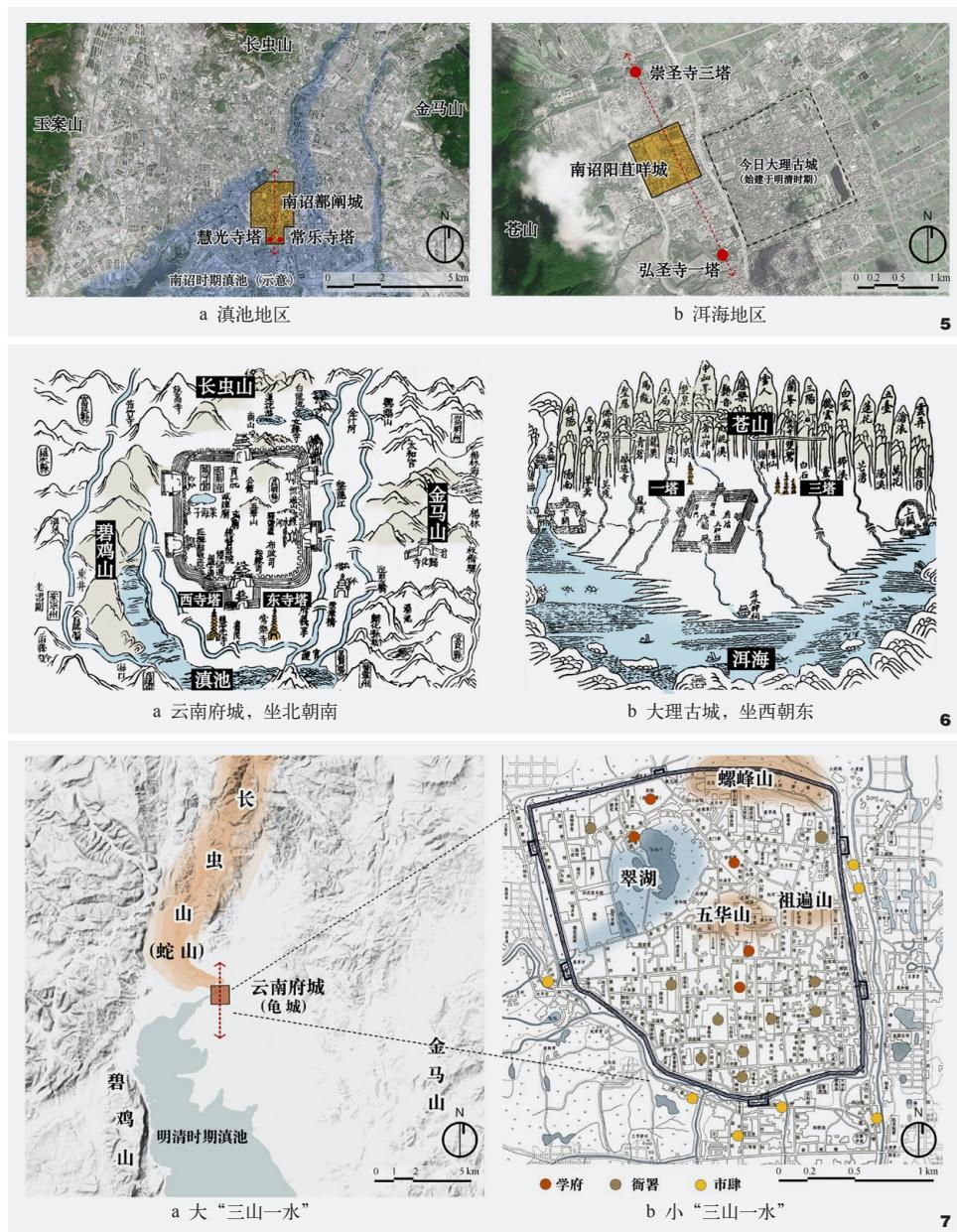


图5 南诏、大理时期城市空间轴线示意  
Fig. 5 Spatial axis of the ancient cities during the Nanzhao and Dali Periods

图6 明清滇池、洱海地区山水坐朝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of mountain-water facing in the Dianchi and Erhai Regions

图7 明清云南府城“山—水—城”空间格局  
Fig. 7 Spatial pattern of “Mountain-Water-City” in Yunnanfu City

者大力扶持得到空前发展，甚至达到“家无贫富，皆有佛堂”的程度。除大量民间佛寺兴建外，城市标志性建筑包括滇池都阐城的常乐、慧光二寺双塔，即今日东寺塔、西寺

塔的前身。双塔是当时城市南北中轴节点，强化中轴序列的同时将城市与滇池湖景衔接，引湖景入城。洱海地区佛教建筑建设更为集中，其中崇圣寺三塔和弘圣寺一塔是阳苴咩

城外重要的城市意象，此外苍山十九峰中十余峰都有寺观，包括中和寺、感通寺、大慈寺等，突出诠释大理“妙香佛国”的地域特色(图5)。

### 3 山水空间营建

#### 3.1 山水坐朝关系

“坐”“朝”是古代营城的一种形式总结，是城市与自然建立对应关系的方式。其中“坐”一定程度解决地势问题，“朝”解决朝向问题。明清时期，滇池、洱海地区城市高度体现出坐朝山水的营建智慧(图6)。

明清滇池北岸的云南府城三面环山，前临滇池，以长虫山为坐山，朝滇池水而设，因城市形如灵龟被认为“龟蛇相交，玄武之象”，其倚山面湖的城市坐朝方式深得山水灵秀。除大的山—水—城环境外，城市内部分区也与山水环境关系密切，总体可被概括为“北学、南商、中官府”。城北以五华山、祖遍山、螺峰山、翠湖为代表，构成“三山—水”结构的山水荟萃地，环境幽静，文庙、书院、贡院等一系列文教机构集中设立；城中心倚靠五华山、南瞰滇池，地势高爽，是整个城市最适宜营建的区域，王府宫苑、府署衙门等都集中布设于此；城南临近滇池，设码头并发展为商埠繁华之地。整个府城高处可远瞰大“三山—水”，近处可尽览小“三山—水”，城市与山水环境浑然一体(图7)。

明清大理古城内虽没有起伏的地形，但因位于苍山麓，整体地势西高东低，高差约35m。城市布局一开始顺应明制坐北朝南而设，但至明末，随着对山水坐朝关系的适应，城内大部分建筑逐步转向坐西朝东，最终形成“西枕苍山，东带洱海，龙首龙尾南北二关复抱其左右”的整体布局<sup>[26]</sup>。此外，坐西朝东的大理古城不仅顺应向背之势，更

将山水之景融贯。其中，古城街巷呈“双十字”格局，西门直对苍山正中的中和峰，故称“苍山门”；东门直对洱海，故称“洱海门”；万历年间还新建魁星阁与东山文笔塔相对（图8）。城市营建在东西向上实现将山、城、水景链接，诠释了高原湖泊城市“山水交于其外，城邑乎其中”的经典格局<sup>[27]</sup>。

### 3.2 山水居游特色

居于山水、游赏山水是人地情感交融的深层体现。宫苑及园林虽未留下相关图纸，但从文字记载中可大致解读其特征。滇池地区，城中轴所对五华山麓背靠山体，前瞰滇池，是全城环境最佳、视野最好的区域，能工巧匠在此处巧营山水，历代都为宫苑所在；城西翠湖，山环水抱，沐英曾在此设别业“沐府柳营”，园林借内外景致建有花坞、亭廊，配有方池、假山等<sup>[28]</sup>，别具匠心；此外滇池边的沐府鱼池，“有楼名簇锦，山茶树四面簇之”，且以鱼池荷塘之景与滇池风光对应（图9）。洱海地区宫苑园林主要营建于南诏、大理时期，其中阳苴咩城内的南诏王大衙门“前有亭，亭临方池”<sup>[29]</sup>，园中引水造景，巧设景亭；城外喜洲附近建“四面邻水，夏月最清凉”的舍利水城<sup>[30]</sup>，引洱海水环园，花木扶疏，既具有佛教氛围，同时更是避暑胜地。如上，人居建筑及园林充分体现了古人的“因借”智慧，宅院因山就势，借山水入园，筑高台以极目远眺，营花木以享林荫静谧，穷尽山水精华。

滇池、洱海地区山水名胜根植于自然的生态环境以及多民族、信仰的人文背景，其中宗教名胜是地区代表，此外多为山地名胜或滨水名胜。滇池畔碧鸡山、洱湖畔苍山因海拔最高、植被风光最好，自古都为山水游赏的胜地。碧鸡山五峰相连，其罗汉崖怪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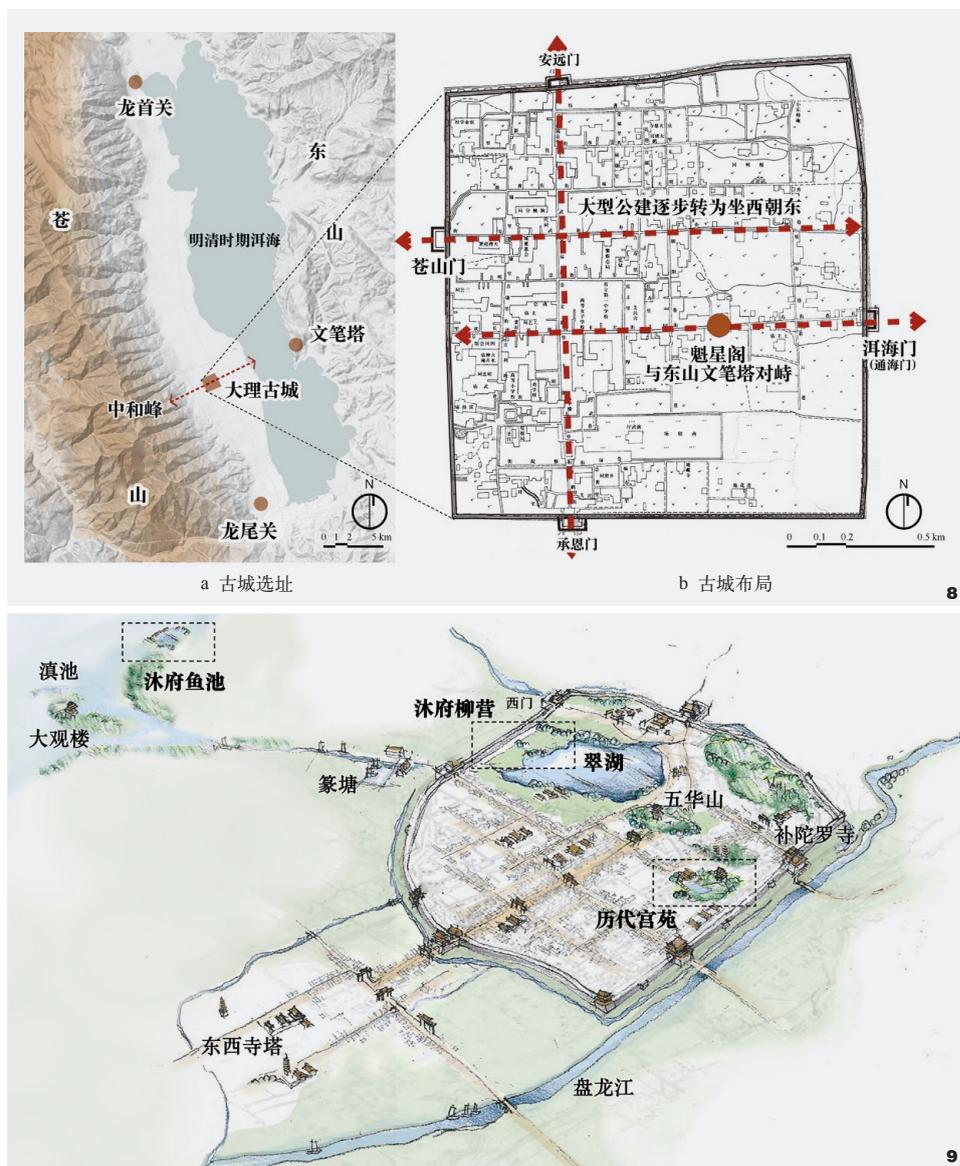


图8 明清大理古城“山—水—城”空间格局  
Fig. 8 Spatial pattern of "Mountain-Water-City" in Dali Ancient City

图9 明清云南府城周边宫苑园林  
Fig. 9 Gardens surrounding Yunnanfu City

嶙峋，山上建筑多选址于东侧，临崖而立，濒临滇池，鸟瞰府城，山水城浑然一体，代表性建筑包括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龙门等，是百姓出游赏景、登高朝拜的城郊胜地。洱海地区所谓“一水绕苍山，苍山抱古城”，苍山最有名的为十九峰、十八溪，十九峰始于龙首关，止于龙尾关，两关与苍山连

接构成了都城的天然屏障，其间村落、城市散布，山壑流下的十八溪孕育了大理千年的璀璨文明。苍山营建主要为佛寺观，多位于苍山各峰“峰半”及山麓相对平缓的山前地带<sup>[31]</sup>，“展苍山、面洱海”<sup>[32]</sup>，择山水灵地将佛迹叠加在苍洱极致的自然环境中<sup>[33]</sup>。

滨水名胜方面，滇池北岸曾临水建大观

楼，时人登楼可感受孙髯翁《大观楼长联》所述“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这样的景象如今已不复存在。和大观楼的登高望远类似，洱海地区也在湖泊四岸建四阁，即天镜阁、珠海阁、浩然阁、水月阁，“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四阁不仅是湖景边的人工点缀，更是人们观览苍洱、游目骋怀的好去处。

由上可知，滇池、洱海地区居游空间与山水环境紧密相关，人与湖山为友，沉淀下深厚的地域山水情结。

## 4 山水意境呈现

### 4.1 山水诗意游赏

古人云“诗言志”“诗缘情”，所以“意境”也就是“诗境”<sup>[34]</sup>，诗中所描绘的诗意游赏方式传达了人与地景间本真的情感互动方式。通过梳理山水诗词，将古人生活中诗意的山水游赏方式概括为以下4类。

(1) 登高揽胜。登山赏景是地区百姓日常出游的一项传统。滇池地区碧鸡山因提供了观览府城、滇池全景的绝佳视角，历朝都留下了许多绝美诗句。元代王昇《滇池赋》：“登太华之群峰，觅滇南之胜概。”描写了登山后可见“府城三市”“湖边双塔”“江畔云津”，完整勾勒出山水与城市景象的视觉互馈。洱海地区苍山更是高揽圣景的绝佳位置，明代杨升庵《游点苍山记》：“山则苍龙叠翠，海则半月拖蓝，城郭奠山海之间，楼阁出烟云之上。”描绘了苍山上环视苍洱山水，俯视图城郭、楼阁的场景。高临景象的众多诗词记录，说明高原湖泊四围诸山自古就是观景胜地，在山、水、城视觉互馈下，诗人极目骋怀，抒发对家乡壮阔之景的感悟与热爱。

(2) 舟游赏景。舟行是古代高原湖泊地区普遍的出行和游赏方式。早在大理国时期的滇池地区，士人群体就盛行“朝泛昆池

艇，夜归官渡村”的生活风尚<sup>[35]</sup>。至明清，出城乘舟更是几乎涵盖了滇池周边重要的游览线路。“九龙池与昆池通，绿波荡漾摇清空。”“扁舟乘兴破春萍，载酒萝崖浮远汀。”众多诗句描绘出周游滇池的无限情趣。洱海地区同样，明代王士性《广志绎》载：“春风挂帆，西视点苍如蓬莱、阆苑、雪与花争妍，山与水竞奇，天下山川之佳莫逾是者。”描绘了乘舟观览点苍山，山水城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的景象。

(3) 观云赏月。云南自古因云闻名，观云赏月自古即是高原湖泊地区文人抒发情志的途径和方式。明代桂慎《登太华山寺》：“为爱白云分半榻，却随明月过双溪。”描绘了登临滇池，可见白云漂浮，月随人动。苍洱间更是云聚云散，天象奇观不绝，雨后初晴的苍山佛光、云束山腰的玉带云、夕阳西落的火把云等，不同云被百姓赋予了不同的寓意。此外，“日月与星，比别处倍大而明。”滇池、洱海地区月亮因白而被称道，元代高昌雅《点苍山》：“水光万顷开天镜，山色四时环翠屏。”描绘了苍洱地区月色动人、山色与渔家灯火倒映水中的别样景致。

(4) 游园恋花。地区人们对花的热爱如痴如醉，史不绝书<sup>[36]</sup>。滇池地区黑龙潭赏唐梅、碧鸡山赏茶花、翠湖赏荷花，在游园中感受四时花卉飘香早已成为百姓日常。此外，百姓对花的眷恋还体现在“售花、戴花、供花”等方面。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菜海子边多花院，名花俱备，以供衙门及公馆。”“滇俗重木香、粉团、金凤，小儿女争戴之。”这些文字记载了滇池地区售花于市，少女爱花、戴花的生动场景，饶有诗意。洱海地区苍山更是“雪与花争妍”，十八溪中有“梅溪”因梅花得名，“桃溪”因桃花得名，正如明代杨升庵《游点苍山》描述：“香风满

道，芳气袭人。”此外，山下坝区“家家养花，户户流水”，大理人不仅种花，还有花的节目“花朝节”。《大理县志稿》：“乡人争胜陈列古玩，并以花术之嘉美者，垒集花山为点景之助。”描写花朝节家家把盆栽花木摆在门口，搭成一座座“花山”，群芳竞秀的美妙场景。

从以上诗文记载中可以感受到风景与人之间的密切情感联系，这种联系是地域山水环境的映射，更是富有诗意的意境写照。

### 4.2 山水八景胜境

“胜境”是美景经由人运用各种文化手段，赋予景象外表之外的意涵<sup>[37]</sup>。云南“八景”文化是汉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滇池、洱海地区真正的“八景”诗文出现于明代，至清末民初达到创作顶峰，相较中原地区出现时间较晚<sup>[38]</sup>。其中，滇池地区八景多集中于北岸的府城周边，被统称为“昆明八景”。洱海地区《大理县志稿》载“太和十六景”，描绘了明清大理府城一带的胜景。“昆明八景”“太和十六景”充分涵盖山、水、城景观要素，诠释出文人独特的地方山水审美倾向。

从“昆明八景”可解读出滇池地区大山宫小山、水系绕城的山—水—城融合关系。其中，城中可看到金马、碧鸡、玉案、长虫等大山环护，并与城中五华、螺峰等小山相融；城间流水形成“坝桥烟柳”的堤岸春色、“高峽晚舟”的暮色归航、“官渡渔灯”的渔舟唱晚；城外水映“虹山倒影”，山观“滇池夜月”“云津夜市”，山—水—城空间视廊通透，彼此交相辉映，这与今日山水与城市割裂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图10）。

“太和十六景”相较“昆明八景”而言，除了同样体现出山—水—城的互融特点，更描绘出了地区“妙想佛国”教景一体、气象

万千的独特风格。其中，“钟震佛都”“台闻仙乐”“塔峙金茎”“云林僧梵”描摹了以崇圣寺、弘圣寺等核心佛寺为代表的山水宗教景观，体现出洱海地区山水景致与佛教教化高度一体。此外，山、水、城景与风云气象之景充分融合，“龙关晓月”描写龙尾关月城山际，倒映海底；“渔楼襟带”描写城内五华楼凭空一望，欲夺星辰灿烂；“鸳浦夕阳”“夏山冬雪”“雨润晴川”“云横玉带”等都突出天光云影、气象风光与自然山水、人工营建的相辅相融，足见洱海地区自然气候环境形成的天象风光意象十分独特，被人深深记忆(图11)。

## 5 结论与启示

### 5.1 研究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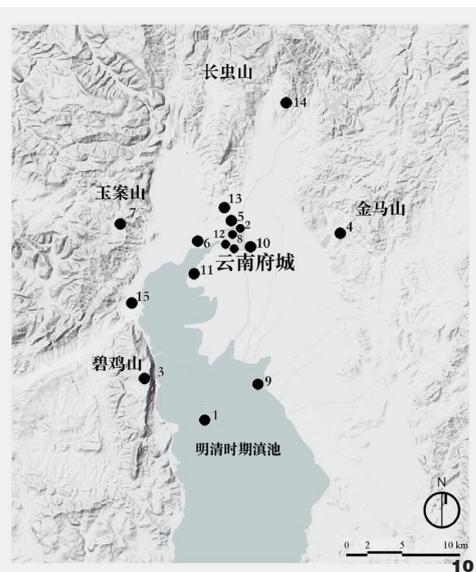
云南高原湖泊地区地景与其他地区相比较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山水本底格局中，湖盆空间向心性、阻隔性强。其中，环山界定了人居的物理及心理边界，湖泊水网奠定了逐水而居的自然基础。但因断陷湖水位不断下降，水文条件的变迁显著影响了地区聚落的发展。

(2) 山水营建深受地方本土文化、中原汉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综合影响。作为云南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西汉后滇池、洱海地区与中原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山水坐朝、城市格局等方面都汲取了中国传统山水文化智慧。但本土文化、佛教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也对营建活动带来了显著影响，特别是大理地区教景一体风格突出，其山水意境在山水文化与宗教文化交融的基础上生成，具有极强的独特性。

(3) 山、水、城链接性强。云南高原湖泊地区空间内聚，山、水、城要素集中，历史时期城市建设凭借空间优势，十分关注山、

编号	地点	(明)沐昂 八景	(清)赵士麟 十二景	(清)张士廉 宋嘉俊八景
1	滇池	滇池夜月	滇池夜月	滇池夜月
2	螺峰山	螺峰积翠	螺峰叠翠	螺峰叠翠
3	碧鸡山	碧鸡秋色	碧鸡秋色	
4	金马山	金马朝阳	金马朝晖	
5	商山	商山樵唱	商山樵唱	商山樵唱
6	虹山			虹山倒影
7	玉案山	玉案晴岚	玉案晴岚	
8	五华山		五华鸾绕	
9	官渡	官渡渔灯	官渡渔灯	官渡渔灯
10	云津码头		云津夜市	云津夜市
11	柳坝桥			坝桥烟柳
12	翠湖		柳屋拖青	
13	莲花池	龙池跃金		
14	黑龙潭		龙泉鱼跃	龙泉古梅
15	高晓		高晓晚舟	



编号	地点	太和十六景
1	崇圣寺	钟震佛都
2	应乐峰	台闻仙乐
3	城内 五华楼	渔楼襟带
4	城东 浩然阁	海阁风涛
5	清碧溪	碧水叠潭
6	梅溪	瀑泉丸石
7	洱海 大鹤洲	鹤洲浮浪
8	龙泉峰	凤眼览辉
9	洱海西岸 马龙峰东	鸳浦夕阳
10	龙尾关	龙关晓月
11	苍山	夏山冬雪
12	太和县境(大理坝区)	雨润晴川
13	崇圣寺、弘圣寺	塔峙金茎
14	苍山	云横玉带
15	太和县境(大理坝区)	云林僧梵
16	洱海西岸	烟水渔灯



图10 “昆明八景”分布  
Fig. 10 Distribution of “Kunming’s Eight Sceneries”

图11 “太和十六景”分布  
Fig. 11 Distribution of “Taihe Sixteen Sceneries”

水、城的空间互融性。云南府城巧取大、小“三山一水”格局进行城市布局和营建，大理古城枕苍山、面洱海，西开“苍山门”、东开“洱海门”，建魁星阁与东山文笔塔互望，都体现了城市营建对山水环境的关注。此外，

山水居游特征突出，山地名胜、滨水名胜的营建使得登高览胜、舟游赏景、观云赏月、游园恋花成为地方独特的人地情感关联方式。

总体而言，以滇池、洱海地区为代表的传统地景研究揭示了云南高原湖泊城市“山

水营城”的传统智慧，为理解高原湖泊地区人地关系演进提供了经典比较案例，并为当代山水城市发展提供了历史镜鉴，对地区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传统范式意义。

## 5.2 研究启示

山水本底及山水历史文化为云南高原湖泊地区可持续发展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区域一体、山—水—城融合是今后地区朝向“山水城市”发展不容置疑的重要原则。当下城市发展应从山、水、城的互融互享角度探索云南高原湖泊城市群特色，城市空间利用及开发在追求功能性的同时，应以山水融城为目标，使高原湖泊城市最突出、最核心的特征得到彰显。

传统山水营建智慧及山水居游体验强化了地区山水空间结构，体现了山水审美追求，是宝贵的历史经验。当下高密度的城市空间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高原湖泊地区传统的山水结构，因视线、游线的阻隔，让人感受不到临山傍水的区域环境，因此在发展中一方面应重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城市空间廊道以实现城市与山水的对话；另一方面应激活贯穿古今的游览方式，根据历史记载让凭栏远眺、舟游赏景、游园赏花的游览点和游览线重新成为与当下休闲空间融合的游赏地。

重视传统山水诗画传达的山水意境，通过“迁想妙得”实现山水城市的栖居目标。在城市化进程中，除了理性的分析和评估，对地方传统山水文化思想、山水审美追求的感悟同样重要。如果说现代社会不再善于“以诗传情”，但“迁想妙得”的诗性思维方式其实并未改变<sup>[39]</sup>。与其从形式上追求所谓“滇式”，或通过重造“古建”以模仿历史，不如通过湖景、山景、花香、阳光、四季等

“亲历”的知觉感知体验，搭建物理环境、生理感知与精神认同三个层面的地方情感关联网络。只有将历史文脉的抽象内涵“迁想妙得”为具象的景观营造策略，实现历史记忆的创造性转化，才能重新建构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地域性“家乡意象”。

注：图6-a底图源自光绪《云南府志》；图6-b底图源自康熙《大理府志》；图7-b底图源自清末《云南府城街巷图》；图8-b底图源自民国初年《大理城街巷平面图》；图9改绘自《昆明市城市设计导则（试行）》；其余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 参考文献

- [1] 孟兆祯. 山水城市知行合一浅论[J]. 中国园林, 2012, 28(01): 44-48.
- [2] 吴良镛. 关于山水城市[J]. 城市发展研究, 2001, 8(02): 17-18.
- [3] 郑曦. 山水都市化区域景观系统上的城市[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 [4] 张雪葳, 王向荣. 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2.
- [5] 张婷婷. 六朝建康城市空间布局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 [6] 张杰. 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M]. 2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 [7] 王树声, 高元, 李小龙. 中国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01): 27-32.
- [8] 杨保军, 王军. 山水人文智慧引领下的历史城市保护更新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02): 80-88.
- [9] 毛华松, 汤思琦, 傅俊杰. 中国古代“城—山”风景的文化意象、空间秩序与景致营建研究[J]. 中国园林, 2022, 38(01): 26-31.
- [10] 毛华松, 梁斐斐, 熊瑞迪. 川江流域传统城镇风景要素梳理及组织特征探究[J]. 风景园林, 2018, 25(09): 27-33.
- [11] 杜春兰, 陈丹阳. 嘉陵江沿线古城“山—水—城”景观特征研究[J]. 中国园林, 2024, 40(06): 6-14.
- [12] 许芾斌, 杜春兰, 赵娟. 明清时期重庆城池空间形态特征分析[J]. 中国园林, 2017, 33(04): 125-128.
- [13] 李恒. 成都平原地域景观体系研究[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8.
- [14] 陆韧. 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 [15] 林超民. 方国瑜文集第一辑[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 [16] 黄耘. 泸沽湖地域人居环境文化演进[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 [17] 方国瑜, 林超民. 云南郡县两千年[M]. 林超民. 林超民文集.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 [18] 熊元正. 南诏史通论[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 [19]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院. 大理丛书: 建筑篇卷一[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5.
- [20] 王苏民. 赛鸿身. 中国湖泊志[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 [21] 陆韧, 马琦, 唐国莉. 历史时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及生态环境演变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22] 彭斌. 最是那一回眸的乡愁——洱海水文化研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9.
- [23] 成瑶. 南诏大理国多元文化特征的文化地理学因素分析[C]. // “决策论坛——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 北京: 《科技与企业》编辑部, 2016.
- [24] 尹露曦. 云南滇池地区传统地域景观研究[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21.
- [25] 朱惠荣. 昆明古城与滇池[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7.
- [26] 彭凤, 朱晓栋. 明代以来大理古城空间变迁研究[J]. 大理大学学报, 2023, 8(07): 1-7.
- [27] 王树声.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云南、贵州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 [28] 余嘉华. 滇文化沉思录[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29] (明) 诸葛元声. 滇史(卷4)[M]. 刘亚朝, 校点. 芒市: 德宏民族出版社, 1994.
- [30] (唐) 樊绰. 蛮书校注[M]. 向达,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1] 宋胜豪. 明清云南八景营造智慧研究[D]. 昆明: 昆明理工大学, 2023.
- [32] (明) 谢肇淛. 滇略(卷2) 胜略[M]. 明刻本: 1368-1644.
- [33] 张剑文. 南诏大理园林考略[J]. 园林, 2020, 37(09): 34-39.
- [34] 孙筱祥. 生境·画境·意境——文人写意山水园林的艺术境界及其表现手法[J]. 风景园林, 2013, 20(06): 26-33.
- [35] 卓维华. 新编昆明风物志[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 [36] 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昆明花卉史话[M].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1999.
- [37] 石守谦. 移动的桃花源——东亚世界中的山水画[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38] 周琼. “八景”文化的起源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以云南“八景”文化为中心[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24(01): 106-115.
- [39] 初冬. 复归“山水”——从山水画到“山水城市”的可能性探析[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